

【电影史】

“新舞台”与《定军山》： 中国第一部电影新考

黄望莉 张 伟

【摘要】近十多年来,关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拍摄出现了一些争议。近期发现的《定军山》放映的说明书对确认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存在和放映有着重大的价值:从中不仅确认了这部电影确实存在,更是挖掘出了“新舞台”放映该片的前因后果。通过深入考察《定军山》的放映史,说明中国电影甫一诞生就与中国戏曲艺术的流动、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也感谢海派戏曲艺术活动为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存在与否敲了一个定音锤。

【关键词】《定军山》;新舞台;谭鑫培;中国第一部电影

【作者简介】黄望莉,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教授;张伟,上海图书馆研究员。

【原文出处】《电影艺术》(京),2022.3.125~131

【基金项目】本文受上海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立德树人”专项“上海左翼电影文化资源传承利用的调研报告”项目支持;受国家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抗战时期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AA001)支持。

近些年,关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议,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些争议主要包括如下几点:首先,1905年由任景丰主导的、在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存在吗?这个拍摄时间确实吗?有关记载有无疏漏之处?所有这些疑问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第一部电影究竟是不是《定军山》?本文论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书商处购得一张收藏,藏品(图1)为一张关于放映《定军山》的广告,从纸张的质地和印刷方法来看,是符合当时的纸质和印刷的技术的,这无疑将引起学界极大的兴趣。本文将就这张宣传广告中的内容和细节进行分析,结合关于这部影片的种种讨论,试图厘清围绕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身上的种种迷雾,从中也可以发现它与“海派京

剧”发展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

《定军山》戏单以及“新舞台”考



图1 《定军山》放映广告(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收藏家张伟收藏)

众所周知,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为,1905年秋,北京大栅栏的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为中国摄制的第一部电影。^①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质疑这部电影是否存在,例如黄德泉研究员在《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一文中(以下简称“黄文”),提出“误传说”,至今也无人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否定黄德泉的研究。具体而言,“黄文”就如下几点提出质疑。首先,作者援引了一些记录、口述等史料,认为这些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这部影片曾经拍摄过。其次,质疑具体的拍摄时间是否是1905年。最后,“以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谭鑫培黄忠扮相’是戏装照,而非电影剧照”^②。本文将在随后的论述中逐一探讨并回答他的问题,从而提出中国确实拍摄了《定军山》这部影片,试图部分地解决其他相关问题,以推动中国电影创作起源说。

非常值得珍视的是,这张《定军山》戏单向今天的研究者传递了关于这部影片的一些重要信息。首先,本文论者认为,这是一张“新舞台”在开幕前内部暖场放映时的宣传戏单,其功用就是给前来的观众交代活动的地点、时间、地点、节目等必要信息。就像今天去看一场话剧、一出京剧时在表演前厅所获得的这次演出的节目单,或者是介绍性的说明书。细看这张说明单上所列:“商办新舞台”“光绪戊申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今日夜开映”“莅沪第一次电影杰作《定军山》”;其次,为了加强宣传,也附带说明,除了中国第一部戏曲电影《定军山》的放映外,还有“兼演最新美国影戏·中外齐备·应有尽有”等字样;最后,戏单下方还详细地列出了一天之内放映的常规时间是:下午“日戏·第一次·三点钟”“第二次·五点半”“夜戏·第三次·九点一刻”。从这些信息上看,可以得到如下判断:

其一,放映时,电影《定军山》是存在的,并已经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电影,这在当时已经得到公认。

其二,当时上海“新舞台”在放映《定军山》的同时,还与一些美国的影片同时放映。这次非常明确的、有记载的电影放映活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1908年新舞台的改良建设也拥有了简单的电影放映

设备。

其三,从戏单的排版来看,这次放映还是以《定军山》为主,其他影片起衬托作用。显然,国族自豪感与大众娱乐的需求在这里得到相当微妙的结合。

那么,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部影片是因何放映,为什么在“新舞台”放映?“新舞台”与中国戏曲及其后与中国电影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一一考证。

据考证,上海的戏剧舞台有过几次形态的更迭:开埠前,上海城镇的演剧及其场所多为“传统的戏曲戏台,这类戏台多数处于城隍庙、天后宫、豫园、张园以及各类行业会馆之中,演出杂剧、弋阳腔、昆山腔和本地的花鼓戏(申曲)等为主”^③。在上海开埠以后,也与之相似,没有什么大的改观。1853年,上海都市雏形建立后,因昆曲戏班衰落,徽班南来,京班兴起,上海逐渐成为海派京剧的重镇。此时的上海演剧场所还是以传统戏台、酒馆、昆曲戏园为主;1890年以后,上海向都市转型,受西人演剧和日本新剧影响,上海京剧开始改良,“文明戏”的诞生与发展最终促成了话剧艺术形式在舞台上的定型,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方话剧发生碰撞,也直接促成了改良京式茶园、西式剧场和仿建新式剧场为主的舞台形态。“新舞台”的诞生就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而出现的。

据论者查阅,大部分关于“新舞台”诞生的记载认为1908年出现的“新舞台”就是上海第一个华人新建的西式仿欧和仿日的改良剧场。历史上有明确且丰富的关于1908年夏月珊兄弟和潘月樵在南市小东门外、十六铺老太平码头附近建造“新舞台”的报道。“那新舞台的布景,完全出于张聿光手笔,后来似乎熊松泉,也继着画布景了,台是活动的,所以大转舞台,常常在广告上大事吹擂。”^④作为民国建立前后第一家主要上演中国传统京剧的新式剧场,新舞台带动了整个上海舞台式剧场的兴旺。而新舞台中的“潘夏诸子”,即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兄弟。京剧名家毛韵珂等则是“新舞台”的核心管理人员。这里也就是后来郑正秋流连往返、大肆书写“丽丽所戏言”的观戏之地。

然而,我们在查阅大量的资料之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图2)^⑤。

在一篇关于民国戏单的研究论文中,就这张照片,作者明确写道:“笔者经眼戏单中,现存最早的、有明确日期的上海戏单为大清光绪丙午年(1906年)八月二十日商办新舞台戏单。”^⑥在图2中,与图1所写的都是“商办新舞台”,可见,1906年即有了“新舞台”,而且,夏月珊、夏月润的名字赫然在演员的名单中。此外,在一篇博士论文中,也看到“最早的新式剧院是新舞台,就是以排演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剧和改良京剧而著名,由京剧艺人夏氏兄弟(月恒、月珊、月润)、潘月樵等于1906年创办,为国人自建的第一座仿欧洲、日本的新式剧场。1917年的新舞台已经不是位于十六铺的那座,而是位于城内露香园九亩地。为砖木结构,钢梁屋架三层结构,约2000座,气派很大”^⑦。这篇论述显然把1906年就出现的旧“新舞台”和1908年开张的新型“新舞台”混为一谈,但是从这个记述中,可以肯定几点:其一,1906年新舞台确已出现了,并且拥有人或者说是主理者也是夏氏兄弟和潘月樵等京剧名家。但是,所谓“为国人自建的第一座仿欧洲、日本的新式剧场”则应当是1908年的事情,这一点在后文中会有论述。其二,据笔者考证,新舞台是经历了几次改建,最起码有1906年、1908年、1917年三个时间段的新舞台。

关于1908年新舞台的开办,可以从当时《时报》的“新舞台开幕纪盛”的新闻报道(图3)中确认,即“戊申十月初三日礼拜二”的前一天,“戊申十月初二礼拜一”,即公历1908年10月26日(当时的周一)开办。这则新闻也详细报道了当地的绅士名流为其发言,以表明十六铺的新舞台的新颖之处,以及开办的宗旨、进步的意义。

总之,这些新闻报道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当时新舞台开办时的情景:1908年10月26日,周一,面对公众正式开放,进行戏曲节目的表演。新舞台的出现深得当地政府的认可,起到“振兴南市”“劝忠尽孝之功”(见图4),故给予大量的优待,如“十年之内不得仿设”(见图4)、“该园开张后如有停在该处门首左旁之马车包车准免执照,惟限定每日下午五时起至散场止”(见图5)等等。这些报道也指出了,“新舞台”是商人徐芝庭“纠集股本”开办的振市公司,“聘请名伶夏月珊等”(图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商办新舞台”的“商办”有两层意思,一是商业股份制经营的“新舞台”;二是指“华商”所办。关于“新舞台”的股份情况,目前所知寥寥,在其他的材料中可以得知,“光绪三十三年,为繁荣华界商业,改良中华戏曲,振兴作为华界地区的南市十六铺市面,当时一批颇具民族意识的开明绅商姚伯欣、沈缦云、张逸槎等,以及爱国艺人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出面集资成



图2 1906年商办新舞台的戏单

◎ 報時二拜禮日三初月十申戊 ◎



图3 新舞台开幕纪盛

立了一个‘振市公司’。振市公司确定了在十六铺创建一座戏院,即新舞台为基业,从而促成南市十六铺地区的商业繁荣”^⑧。究竟海派名伶夏氏三兄弟、潘月樵、毛韵珂等人有无新舞台的股份,本文论者尚未考证,但是,已知“新舞台”的经理是夏月珊,其他实际掌握演出话语权和经营的关键人物就是夏氏三兄弟以及潘月樵、毛润珂五人。这也是为什么后人说起“新舞台”都会说夏氏兄弟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还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今天看来,为什么关于1908年开办的新舞台的记载如此之多,甚至奉为“新舞台”之始,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地点的变更。1908年的新舞台地址是新位置,俗称“南市”,具体位置在南市小东门外、十六铺老太平码头附近,属于上海的老城厢剧场区。正是由于新舞台的出现,南市后来也逐渐发展起来。其二,新舞台是民国前期传统戏曲演出转移到改良剧场和西式剧场中之肇始,在中国戏曲表演史上具有开创先锋的地位。其建造的装置、绘制布景、安装转台,邀请日本布景专家和上海美术家张聿光担任布景绘画师,成为中国首家近代化剧

场。后来曾在这家剧场演出过的梅兰芳曾回忆说:“看到这种半圆形的新式舞台,跟那种照例有两根柱子挡住观众视线的旧式四方形戏台一比,新的是光明宽敞,好的条件太多了。”^⑨这些都说明新舞台在海派戏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其三,因其主持者都以“改良”“维新”推动中国海派戏剧的发展为宗旨,他们改良剧场、改良京剧、宣传维新,出演的《黑籍冤魂》《潘烈士投海》《明末遗恨》等新戏在当时国内戏剧戏曲界有着“开通社会之先声”的美誉,甚至,潘月樵还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被誉为“梨园将军”。

1908年开办的新舞台无意中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提供了放映的场所。

对《定军山》“误传”说的质疑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考证“新舞台”的开办时间,目的是为了解析图1的戏单,以证《定军山》的存在。这张戏单上的“光绪戊申年”即为公元1908年,这一年,正如前文所述,开办了新舞台。年末,光绪帝崩世。在新与旧的更迭交替中,电影也在上海闪烁着光影。图1戏单上所写的“莅沪第一次电影杰作”,清楚地说明《定军山》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杰作”,“莅沪”是指在上海放映。“九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八日”是具体放映时间。根据当时所习惯的农历的日期,对应着今天的公历换算一下,当时的“九月二十三日”应为10月17日(周六),二十八日则为10月22日(周四),共放映6天。这个时间正好与前文对1908年新舞台正式运营的时间:10月26日(周一)相吻合。也就是说,电影《定军山》的6天放映在“新舞台”开场前的一周,是为“暖场”放映。电影《定军山》作为新派改良戏剧舞台的“暖场”活动,既符合开办者们对戏曲(如京剧等)表现形式的开放心态,也体现了现代声光艺术与上海近代新型舞台技术与艺术形态的契合。

回到中国电影开端的现场,关于《定

● 報 時 二 拜

案矣
 起見並非等利把持業已批准照辦一面轉稟滬道觀察察立
 仿設等情工程局各董以該商所稟係為振興市面改良風俗
 局立案保護禁止差傳堂戲以及城廂內外於十年之內不得
 有差役藉藉衛衙署堂戲為名仗勢欺詐不得先行稟請工程
 夏月珊等改良戲曲俾得商家宴客均可舍北就南惟戲園每
 設振市公司在於太平碼頭先開戲園命名新舞榭聘請名角
 劇皆是傷風敗俗之戲絕少勤忠敬孝之功爰特糾集股本創
 立振市公司在於太平碼頭先開戲園命名新舞榭聘請名角
 應以南市市面向不及租界繁盛以致商家宴客等事均赴北
 市現擬設法振興南市藉可挽回利權且租界各戲園所演戲
 劇皆是傷風敗俗之戲絕少勤忠敬孝之功爰特糾集股本創
 立振市公司在於太平碼頭先開戲園命名新舞榭聘請名角
 夏月珊等改良戲曲俾得商家宴客均可舍北就南惟戲園每
 有差役藉藉衛衙署堂戲為名仗勢欺詐不得先行稟請工程
 局立案保護禁止差傳堂戲以及城廂內外於十年之內不得
 仿設等情工程局各董以該商所稟係為振興市面改良風俗
 起見並非等利把持業已批准照辦一面轉稟滬道觀察察立
 案矣

十箱及本館等物計日少輕到起算
 新舞臺看戲車准免執照 ○南市新舞臺戲園業經工竣定於
 廿月初開演園主以北市來南之車輛定章無工程局照會不得越界
 殊於生業有昨直商總工程局通融辦理經局董公議戲園開張後如
 有停在該處門首方傍之馬車包車准免執照惟限每日下午五時
 起至散場止其非看戲之車輛仍一概查究業將出示曉諭矣

图4 总工程师批准新舞台戏园稟请立案保护

图5 新舞台看戏车准免执照

军山》的说法很多,记述也很多,相关的争论也很多,此处不再赘言,然而其中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是:是否有这部影片?如果有,在哪里何人所拍?拍摄时间是哪一年?毫无疑问,这张戏单非常明确地说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确实存在过,且在上海放映过,放映的时间也是明确的。只是对拍摄时间、地点、拍摄者还暂时存疑。

本文在阅读很多相关的否定《定军山》的论文中,如黄德泉的《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提出的“误传”说,笔者认为有待商榷。首先,要为《中国电影发展史》说一句公道话,这部专著由于时代的限制,虽然意识形态偏“左”的评价在当下已显不合时宜,但是,其对于史料的整理和文献价值是应当肯定的。这本专著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所做的梳理是几代学者和专家与当事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对其史实认定的否定应当秉持审慎的态度。当代由于数字人文技术的检索能力的提高,新的史料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近些年来,在对中国电影重新书写的过程中,大部分都是对原史实进行了修正,而非完全否定或推倒重来。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黄文中的“某剧作家言”“只能作为传言看待,而不该当作史料,即使它们在将来有可能被考证为史”^⑩的说法是不客观的。因为,这篇1938年关于《定军山》的记述与具体发生时间相距不远,当时经历者口口相传的历史很大概率是有事实基础的。事实上,今天所发现的这个戏单也不是电影人留下的记录,而是戏剧活动所保留下来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电影诞生的偶然性、非相关性(即并非是中国电影人自觉的创作,真正的自觉创作是在1910年以后)。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量说法都是来自戏剧家及其相关人员的记忆和口口相传,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这些多种媒介形式的史实记录不应轻易否定,除非有确切的客观史料证否。

无独有偶,黄文中再次使用了程季华的另一篇论文中提到的“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摄制了京剧‘定军山’中之请纛、舞刀、交锋等各个

场面,是由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表演的”^⑪。这个1908年的说法在黄文中被认为是“推断”,如果说1908年的具体年份或许和《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论述有所偏差,但是,也为本文寻找电影拍摄的时间提供了信息。有一点可以肯定,《定军山》的拍摄是在“光绪末年”,那么也有可能就是公历1908年,即光绪帝去世的这一年。按照黄德泉的考证,他更倾向于1908年拍摄完成的说法,也不无道理。还有,众所周知,一部影片从拍摄完成到剪辑放映是需要一定时间完成的,因此,在“某剧作家言”中,拍摄时间和放映时间的偏差是正常的。这里有一个猜想,《定军山》是存在的,其完成时间则应当在1905年和1908年间夏秋交替之际^⑫,并在北京放映过(这一点也有很多的记载),10月中旬在上海新舞台开张的“暖场”活动,这部影片恰逢其时,在总共放映了6天之后,戏曲演出活动才正式登场。

那么,为什么“新舞台”会选中这部影片作为“暖场”放映,难道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电影”吗?事实上,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谭鑫培与“新舞台”夏氏兄弟的密切关系。我们在谭春发先生书稿中发现,谭鑫培是夏月润的岳父^⑬。尽管,谭春发先生的这本书有小说虚构的成分,但是,谭春发老师的考据是认真严谨的,况且这种人物关系是无法杜撰的。^⑭笔者查阅到谭鑫培到沪演出考证的文章中,谭鑫培一共到沪演出7次。自从新舞台1908年10月开办后,谭鑫培分别于1909年12月、1912年11月以及1915年8月三次到上海演出,要么坐镇新舞台,要么在新舞台客串一场,再没有去别处。^⑮1909年这一次演出是应其女儿的邀请,夏月润作为女婿亲自到天津接他一路到上海,坐镇“商办新舞台”。可见,“新舞台”的主要运营人夏氏兄弟与谭鑫培的翁婿关系使得“商办新舞台”开办前的“暖场”戏,在谭鑫培不能到场祝贺的情形下,使用戏曲电影《定军山》是再妥帖不过了。

“海派”之于中国的戏曲和电影

回到图1,了解《定军山》作为中国第一部电影,关于它的记载都与电影在中国的传播、戏曲的改良、

京沪戏曲的流动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前身后世都充分说明,当电影进入中国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戏曲的艺术经验已经成为最便捷、最具有大众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因此,电影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媒介成功地嫁接起戏曲艺术与都市现代性生活体验,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电影《定军山》的考证,众说纷纭,尤其是黄文中一个重要的质疑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所用的照片与《戏剧月刊》上的照片有差别,即用“圆头刀”还是“尖头刀”的照片,如果不能确定哪一张是电影《定军山》的照片,那么,就应当是戏装照。对于这一点,黄文中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他无意中帮助我们回到图1,对比之下,部分地解答了相关的疑问。观察本文图1中的照片,由于戏单年久磨损,印刷质量也不高,戏单上的电影剧照中已经无法确认是圆头刀还是尖头刀,再仔细看这是半身照,和《戏剧月刊》上的全身照不同。那么,究竟全身照是戏照,还是半身照是电影剧照,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电影最容易因为镜头的推拉摇移(或许当时只有简单的摄影机移动)才不会出现戏照那样标准的摆拍镜头,而剧照是从胶片中一格洗印出来的,随意性更强一些。而且从印刷和曝光的角度来看,右手边的圆头刀是和戏单上的相似度更高一点。《剧学月

刊》[®]上同时刊登的两张照片及其论证也确实为我们今天考证哪张是剧照、哪张是戏照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意见,可以留待后续进一步探究。

本文在考察图1的戏单之时,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电影的开端与戏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定军山》的诞生时机恰是中国新旧交替、中外文化碰撞的时代,电影媒介与舞台媒介对戏曲表演美学的革新不仅记录在报纸媒介中,更因为印刷形态的多样化,让今天的人们能够获得这一对中国电影开端问题进行考查的可能。其次,新型舞台形态的变迁也无意中为电影的发行和放映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从1897年中国最早电影放映的时候算起,到《定军山》的拍摄和放映,即使从1908年算的话,也有十多年的电影放映历史。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北京,很多娱乐场所(如戏院、游乐场等地)对英美电影短片的放映已经普及,中国新型商人,如任景丰诸人以及新舞台的经营者们,他们既是专业人员(摄影师、名伶),更是行业运营的操盘手,现代都市的开放和交流,从业人员开放的心态,都为中国电影的本土化和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任景丰的丰泰照相馆也正是因为见识到在大观楼放映西方电影的魅力才想到为谭鑫培60寿诞拍摄《定军山》,一则是为了表达对“伶界大王”的敬意,二则又何尝不是因为在大观楼放映中国人自己电影的愿望所驱使的呢?同样,“新舞台”作为开风气之先的舞台结构改良的先驱,其经营者们对电影《定军山》选择放映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当电影在还没有作为独立的产业经营状态下,实际上大量的放映是与戏曲文化的推广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需要意识到,海派艺术的发展是基于对媒介变迁的快速接受、运用、展示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而实现的。事实上,考察清末民初戏曲表演的发展,北京的戏曲表演的舞台经常受到经济和战争的双重影响而成为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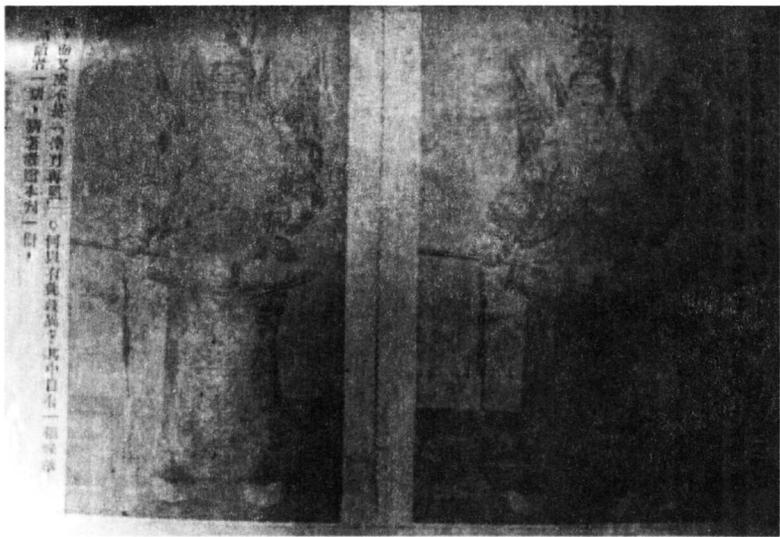


图6 《剧学月刊》1932年第1卷第4期封底图[®]

砾堆,如庚子年动乱、大栅栏的戏园子被毁,包括其后的大观楼被焚等等,都加剧恶化了当时京派戏曲艺术表演的生存环境。很多戏曲名家纷纷南下上海,重操旧业,挣钱养家。这些南来戏曲名家与海派戏曲名家的融合与交流极大地带动了海派戏曲艺术表演的发展。同时,上海的传统戏园子表演场地,因海外交流的便捷,不仅形态丰富,更是在清末逐步更新到以“舞台”为形态的表演场地,甚至最后发展成类似“大世界”这样的综合娱乐表演场所,其宽敞的新式的表演舞台、丰富的声光电的辅助表演手段,都促进了海派艺术(包括戏曲艺术)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电影也伴随其间,始终与戏曲结缘,无论最早的戏曲表演,如谭鑫培的《定军山》以及名武生俞菊笙与名武旦朱文英合拍的《青石山》的对刀,名武生俞振庭拍的《白水滩》《金钱豹》,以及后来对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大量记录,还是电影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与戏曲的结缘,包括今天用3D技术拍摄京剧电影,更加成为京派艺术和海派精神有机结合的明证。

因此,关于中国电影史开端的这部影片在戏剧界得到广泛认可,并且也有口述、记录、新闻,都没有否认过这部影片的存在,例如,梅兰芳的回忆,包括许姬传的见闻录当中的一些说法,尽管他们的表达当中有一些不确定和随意的地方,这些地方并不能成为否定《定军山》存在的事实,更应当作为我们需要进一步修正或者明确去追根溯源的一个过程。此次这张戏单藏品的问世,再一次确认了电影《定军山》存在的事实。它的传播和跨区域流动和放映的史实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就得到充分的展现。事实上,近些年来,重新发现的中国早期影像资料大部分都是因为跨国、跨区域交流和放映而无意中保留下来的,如《盘丝洞》《风雨之夜》等。此次,我们在这张《定军山》的放映说明书中不仅获得了中国第一部影片的信息,更明确了一百多年前京沪两地戏曲文化的流动和转型,以及影像媒介为京沪两地,尤其是“海派京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佐证材料。

注释:

- ①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13-14.
- ②黄德泉.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当代电影,2008(2):110.
- ③贤骥清.民国时期上海剧场研究:1912-1949.上海戏剧学院博士论文,2014:34.
- ④钱化佛.三十年来之上海.上海:上海书店,1984:15.
- ⑤转引自陈浩楠.民国时期上海戏单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12.12.
- ⑥陈浩楠.民国时期上海戏单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12.
- ⑦沈亮.上海大世界(1917-1931).上海戏剧学院博士论文,2005:51.
- ⑧参见一则宣统年间《上海著名之商场》的简介,转引自:沈定卢.新舞台研究新论.戏剧艺术,1989(4):62.
- ⑨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1集).上海:平明出版社.1952:148.
- ⑩黄德泉.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当代电影,2008(2):104.
- ⑪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中国电影.1956(1),转引自黄德泉.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当代电影,2008(2):105.
- ⑫王大正的《关于中国电影诞生三处质疑问题的订正解析》一文详细论证了关于谭鑫培60大寿的具体日期以及电影拍摄的时间推断,其中虽有些牵强之处,但是基本上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也就是说,电影《定军山》的拍摄很可能横跨1905年秋,到1906年春完成,直到1908年的轰动,这些都为《定军山》在上海的放映提供了佐证。
- ⑬谭春发.开一代先河: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55.
- ⑭笔者作为谭春发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曾经与他讨论过,他曾明确表示,他的史实是经过考据的。
- ⑮李世强的《谭鑫培赴沪演出史事略证》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谭鑫培7次南下上海的演出经历。
- ⑯《剧学月刊》1932年第一卷第四期封底。转引自黄德泉.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当代电影,2008(2):110.
- ⑰黄德泉.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当代电影,2008(2):110.